

经典作家

纪念



杨绛(1911—2016)，原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作家、翻译家、学者。先后就读于东吴大学、清华大学。1935年起，留学于英、法。1938年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文系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40年代，她创作的喜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上演后，广受赞誉。1981年，散文集《干校六记》出版，文字含蓄，叙述温婉，以个人的经历折射时代的光影。1988年，长篇小说《洗澡》出版。2003年，传记作品《我们仨》出版，以写实与梦境相结合的手法，回忆一个家庭60余年间的情感守望。杨绛在翻译领域成就斐然，翻译了《堂吉珂德》《斐多》《小癞子》等经典作品。另著有文学评论集《春潮集》《关于小说》等。

今年是杨绛诞辰115周年、逝世10周年，本报特邀学者陈众议、陆建德撰文，评述杨绛的文学追求和写作成就，追忆她的人生情怀和深远影响。

——编者

大學者兼小說家

戲贈管城作者

楊絳 壬申四月



杨绛手迹

《堂吉珂德》,[西班牙]塞万提斯著,杨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3月

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

楊絳

今年是杨绛先生诞辰115周年。十年前,她以106岁高龄安详地告别人世,无数读者和媒体在哀思中为她送行,本人不才,也曾以一篇《永远的女先生》表达了悲痛和吊唁。怎知岁月如白驹过隙,一晃三千六百多个日子匆匆飞逝,再沉下心来追思故人,却是另一番心境。时代不同了,AI强势来袭,富人的财富呈指数级增长,但普通人的日子依然不易。杨绛先生和钱锺书先生在世时省吃俭用,将所得稿费悉数捐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旨在奖励贫困学子的“好读书”奖学金。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年轻时因家道中落和战乱频发也曾有过捉襟见肘的窘迫日子,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心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道的情懷,也不至于连房子都舍不得装修,一色的水泥地和铁框架,外加一大一小两张旧写字台和为数不多的书籍直至终老。

说到书籍,用钱先生的话说,“图书馆有的是,何必多此一举藏在家里”,而杨绛作为他“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一辈子无怨无悔地守在身旁,早将自己忘个干净。诚所谓对己勤俭,予人慷慨。是的,钱杨二位先生藏书不多,他们的取法是借书与读。用钱先生的话说,个人藏书再多也不过沧海一粟。因此,他们是图书馆的常客,无论国内国外,所到之处,概莫能外。过去,我所在的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就曾留下过钱杨二位先生的大量手迹,当时,每一册图书的封底,或内或外皆有一只小纸袋,里面装着一张借书卡。借阅者须在卡片上签个姓名,写上日期;书借走,卡片留下。我初到外文所时,发现许多图书卡片上都有二位先生的签名。而且,从年长一些的前辈同行口中得知,钱先生一直是图书馆的义务订购员。他为外文所和文学所图书馆订购的图书不计其数,荫庇数代学人并将继续惠及后生,在钱杨二位先生看来,所谓学问,无非是荒江野老屋中三两寒心之人商讨培养之事,而图书馆便是这个荒江野老之屋,前人通过自己的把舵,阅读和著述传承经典,滋养后学,培植德性。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晚期者和我国新文学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杨绛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

独具审美意蕴的喜剧幽默

杨绛原名杨季康,1911年7月17日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杨荫杭时任京师高等检察长,曾负责海外,是革命家、文学家和翻译家。杨绛的一生,见证了从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波澜壮阔。出身名门的她,自幼便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但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起伏。先是其父因审判交通总长许世英被贬、叛国案而闻名,却也因此遭到打压,并被革职。离开政坛后,他投身报业和文字工作,但毕竟没了先前的地位和收入。五四运动时期,杨绛曾跟随姐妹们参加反帝反殖民主义游行,目睹了军阀暴行和国家屈辱。这些历练皆为其后的创作累积了生活素材。1936年,她与清华同学钱锺书结婚,嗣后一同前往英国留学,也曾转道法国,直接浸润于西方文学的沃土。正因如此,杨绛的创作与生活、时代、与西方文学紧密关联。1938年,钱杨伉俪因为舍不得不得回国而毅然回国。在动荡的年代,如抗战时期,他们以独特的笔触描绘了乱世中人们的生活状态与精神世界。像杨绛的喜剧《弄真成假》等作品,便是那个时代上海人作为二等公民的写照。而在相对和平时期,她又以细腻的笔触和我们这个时代中流落出丑角,最终“使丑角儿拔,用力过猛,脚踏跌坐在地上,爬起来只剩有几茎残须”。这些个充满情趣的描写,既令人忍俊不禁,又难免让人酸辛落泪。至于《洗澡》这部“新儒林外史”,以“三反”运动为背景,却用了“采购采购”“如雷院衣”“沧浪之水清兮”那样雅致的诗经化标题,看似幽默,实则暗含讽刺。“采购采购”原诗写弃妇归诉;“如雷院衣”隐喻心中幽怨如未洗的脏衣,对应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沧浪之水清兮”则反讽“改造”过程——洗澡,所谓水清可濯濯,水浊可濯足。其中,朱干娘的“脱胎换骨”最为不易;他先是急着讨好群众,使出浑身解数把自己扮成大花脸;继而又诚惶诚恐坦白交代,最后自杀未遂又添了“负隅顽抗”的新罪名。杨绛在序言中写到,想起“脱裤子,刷尾巴”运动,就如同木刻线装书插图中国“衣冠楚楚的人拖着毛茸茸的长尾”,“假如尾巴巴只生在知识上或思想上,经过漂洗,该是能够清除的,假如生在人身体内,那就连着背脊和皮肉呢。洗澡即用肥皂刷的碱水,能把尾巴洗掉吗?”说到批判时,她说:“我觉得与其骂人,宁可挨骂,因为骂人是自我表演,挨骂是看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演。”

这里须提及我国现代话剧的另一位先驱李健吾先生。他不仅鼓励杨绛写剧本,而且客串了她的处女作。李健吾先生因作品中空洞流俗引起思想,于1945年初遭到日本宪兵的抓捕和折磨,杨绛曾到在《恐怖》的日本人——文中对此予以揭露和讽刺。由此可见,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旧上海,写作是需要勇气的。杨绛的喜剧以家长里短的剧情,让人们在阴霾中看到一丝光明,那便是本分和真诚的可贵。

蕴含缜密与睿智的译作

新中国成立后,杨绛积极投身于新中国文化建设。她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身)工作。这一时期,国家对文艺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杨绛在努力适应这个时代的同时,于50年代末受林默涵等中宣部领导的指示,接过了翻译《堂吉珂德》的任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刚一提出,时任国务院总理兼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和副部长周扬、林默涵等同志便着手设计“三套丛书”,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后更名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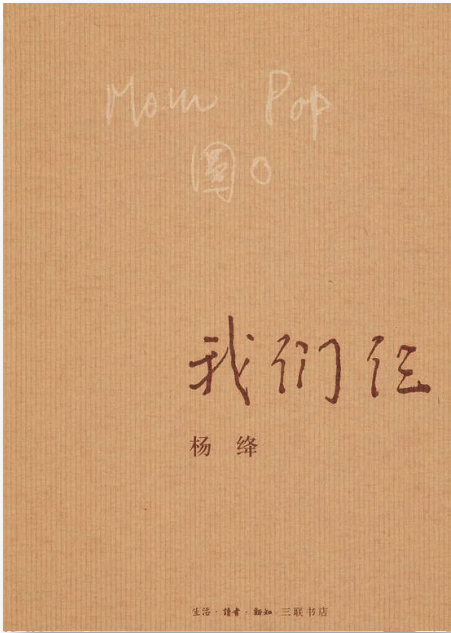
众所周知,《堂吉珂德》是西班牙语名著,杨绛虽精通英语和法语,却并不满足于转译,甚至她曾于1950年赴上海人民出版社之邀从英文转译了第一部西班牙语文学名著《小癞子》(1978年又从西班牙语原文译出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她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她当时已届半百,恰好与马克思自学西班牙语年龄相仿。而马克思的课本也是《堂吉珂德》等西班牙语文学名著。1964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国科学院成立外国文学研究所,杨绛和钱锺书,以及萧干、李健吾、卞之琳、罗大冈、罗念生、袁宝麟、袁可嘉等一大批著名外国文学翻译家随即进驻该所,并接手“三套丛书”工作。有人对杨译《堂吉珂德》进行各种挑剔,却大多牵强。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毕竟是从一种语境和文化传递至另一种语境和文化,其难度可想而知,而归化还是归异化亦因对象而异。杨绛时而直译,时而意译,不仅尊重原意,而且考虑到中国读者的接受,用她的话说,那是个“一个‘仆主’即奴”戴着镣铐跳舞的难事,即既要忠于译者作,又得扣人心弦吸引中国读者。

她翻译《小癞子》就曾遍索所有,甚至到不列颠博物馆查找资料,因为原著那个书名(托尔梅斯河上小拉撒路)的生涯及其幸福实在难以让中国读者理解,她颇感苦心,终于将其译作《小癞子》。杨绛之所以如此翻译,是因为她发现《路加福音》中有个叫拉撒路的麻疯皮子,我们不妨将杨绛先生的考证摘录如下:“早在欧洲13世纪的剧里就有个瞎腿儿人的邻路孩子;14世纪出现的欧洲文学,那个邻路孩子有了名字,叫小拉撒路……我们这本小说里,小癞子偷吃了主人的香肠,英国传说里他偷吃了主人的鹅,德国传说里他偷吃了主人的鸡,另一个西班牙故事说他偷吃了一块肥肉。伦敦不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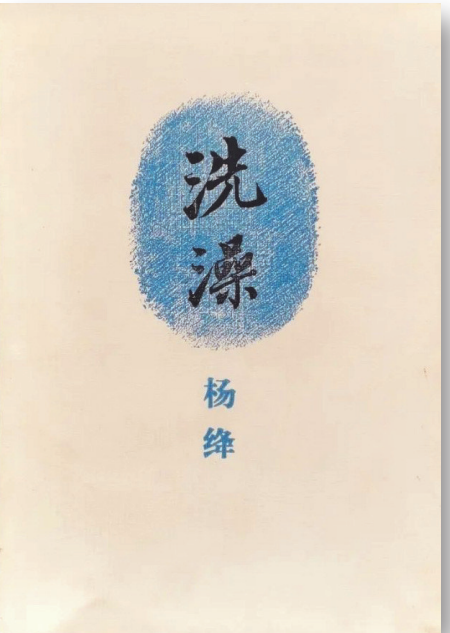
经典

含泪的笑和善良的心

□陈众议



《我们仨》,杨绛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7月



《洗澡》,杨绛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12月

颠博物馆藏有一部14世纪早期的手抄稿(Descretales de Gregorio IX),上有7幅速写,画的是瞎子和小癞子 的故事……从那7幅速写,可以知道故事的梗概。”汉语里的癞子也并不仅指皮肤上生有癞疮的人,而是泛指一些混混。残唐五代时的口语就有“癞子”这个名称,指无赖;还有古典小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里的泼皮无赖,也常叫作“喇子”或“辣子”,跟“癞子”是一音之转,和拉撒路这个名字也意义相同,所以杨绛便巧妙地删繁就简,将书名译作了《小癞子》。将堂吉珂德的瘦马组合一作骛骑难得,或者将原着的几种权威版本进行仔细比较,同样蕴含着作者的缜密与睿智。《堂吉珂德》译稿曾在政治运动中被收缴,多年后由同事张黎将其交还给杨绛,那可是她十几年的心血啊!

儒家文化的叙事阐释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杨绛从早期的剧本写作转向了散文和小说。散文方面,《干校六记》以平实的语言记录了一段非凡经历,诉说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艰辛;小说方面,《洗澡》以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为背景,反映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跌宕起伏。

杨绛的散文和小说创作沉郁、深刻,却不失幽默。她摒弃了早期以讽刺为主的手法,而是更加细腻地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时代的某些荒诞镜像,叙述含蓄、克制,智性中带着“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华美学底蕴。譬如,在《干校六记》中,她用谐音制造微妙的讥讽,最经典的是小阿“小超”乃“区”姓诗人绰号,因其经常被别人读作“超”,也便成了“小超”。将像小狗一样趋炎附势,但同时又颇有小资情调。在那个谈“资”色变年代,这个命名本身就暗含了诸多苦涩的无奈。又譬如写泥泞路上行走,“雨靴虽是高统,一路上的泥烂泥皆变成‘股力士’,争着为我脱靴”,“股力士”谐音“高力士”;而被雨水浸坏的泥岸则戏称为“酥堤”(谐音西湖“苏堤”)。再譬如,她那带中作乐的本领无与伦比,写精心缝补的破呢穿上,“坐处像个布满经纬线纬线的地球仪,而且厚如龟壳……穿上好比身带那些个座儿”。写冒雨种萝卜“培养尖子”,把萝卜尖全用来肥那些宝贝,最终“使丑角儿拔,用力过猛,脚踏跌坐在地上,爬起来只剩有几茎残须”。这些个充满情趣的描写,既令人忍俊不禁,又难免让人酸辛落泪。至于《洗澡》这部“新儒林外史”,以“三反”运动为背景,却用了“采购采购”“如雷院衣”“沧浪之水清兮”那样雅致的诗经化标题,看似幽默,实则暗含讽刺。“采购采购”原诗写弃妇归诉;“如雷院衣”隐喻心中幽怨如未洗的脏衣,对应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沧浪之水清兮”则反讽“改造”过程——洗澡,所谓水清可濯濯,水浊可濯足。其中,朱干娘的“脱胎换骨”最为不易;他先是急着讨好群众,使出浑身解数把自己扮成大花脸;继而又诚惶诚恐坦白交代,最后自杀未遂又添了“负隅顽抗”的新罪名。杨绛在序言中写到,想起“脱裤子,刷尾巴”运动,就如同木刻线装书插图中国“衣冠楚楚的人拖着毛茸茸的长尾”,“假如尾巴巴只生在知识上或思想上,经过漂洗,该是能够清除的,假如生在人身体内,那就连着背脊和皮肉呢。洗澡即用肥皂刷的碱水,能把尾巴洗掉吗?”说到批判时,她说:“我觉得与其骂人,宁可挨骂,因为骂人是自我表演,挨骂是看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演。”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杨绛的创作发生了明显的主 题和风格转变。年逾古稀,她愈发注重生命、人性、爱情、家庭。她的散文集和传记《将饮茶》《杂记与杂写》(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看似对一些故人佚事的回忆,其实是放下 了不完美的琐碎杂事,转而思求人生意义。其中关于李健吾被 日本宪兵捕杀和受辱的文章便载于《杂记与杂写》。即使像朱 永别、丈夫仙逝,她也没有放弃爱意的表达。代表作《我们仨》甫一出版,便成为传记文学的传奇,它以真挚而朴素的情感回 忆了作者与钱锺书以及女儿钱瑛一家三口日常生活的点滴, 展现了三人之间的大量生活细节和无数动人情景。书中的有些 插图由钱锺书亲手执笔,在双向面对、洗澡之后继续探寻知 识分子做真人真事。杨绛用小说向周围结局流出了西方思维排 斥的中国式善意。她曾谓:“我特意要写姚宏和许彦成之间那 份纯洁的友情,却被人在这般糟塌……现在趁我还能在,把故 事总结了吧。”这部续作给了《洗澡》人物一个“被打转弯” 的圆满结局。《洗澡》中,许彦成与姚宏的感情平静乎礼之后, 而许彦成与杜丽琳的婚姻也维持着表面的平静。《洗澡》之 中,许彦成的妻子杜丽琳因多嘴在鸣放时被被打成“右派”。 在下放劳动改造的过程中,她与同为“右派”的叶丹产生了互 相爱慕的感情。回家后,杜丽琳主动提出与许彦成分手,两人和 平解除婚姻关系,各自寻找到了称心如意的情感归宿。随许 彦成与姚宏之间那份纯洁的友情也终于修成正果。在一个中 秋佳节,两人喜结连理,实现了读者期待的圆满结局。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长河中,杨绛的幽默和细腻善意犹如 璀璨的星辰,诠释了“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儒家文化,也 用善良的心和智慧的光点点燃了生活的希望。她把生命中最后 的眼泪化作了字里行间的真心诚意和无私奉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从「形俎而神在」到「灵魂不灭」

□陆建德



2013年,陆建德拜访杨绛 黄 梅 摄

没有动笔,当时以为为怀念亲人的文字,往往是不宜评论的。二十多年过去了,值此杨绛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我还是想补交这一份拖延太久的作业。《我们仨》印了再印,发行量极为可观,而各种形式的评论也是不可胜数。笔者在此主要就这本书里带有梦幻或象征性质的一些文字略作解释,如果失之牵强,希望读者不吝指教。也许,我自以为值得分享的内容无非是拾人牙慧,这是我的无心之失。

《我们仨》的文字虚实相生,并非一部自始至终力求真实的散记。第一部《我们俩老了》极其短小,仅四五百字。梦境中两人外出散步,黄昏薄暮中钱锺书恍惚不见了,荒郊野地上的大声呼喊被“野兽吞了。难道是他忘了同行自顾自先回家了?此时钱锺书半夜醒来,觉察到了夫人的埋怨,就叫她“做了个长达万里的梦”。

书的主干第三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完全写实,记述了他们的世生,这一部分读者应该比较熟悉,本文就不再谈了(但是会用到里面的一个细节),在此主要想说一说我阅读第二部《我们仨》的一些感想。

这部分共三节,分别为“走上古驿道”“古驿道上相聚”“古驿道上相失”。古驿道虽系象征,包容得了多种阐释,作者却工笔细绘。这是一条无数人走过的生命之路,新作者交代了它的东西走向,似有路标,下面还有一行行的小字,模模糊糊,略可辨认,“如桐陵道,咸阳古道”。这两个地名隐约提示了唐代长安。杨绛从三里河寓所到北京医院探病,长安便是必经之路。但是把古驿道理解为长安街的名称,甚至再引申到东单附近紧挨着长安街的那座北京医院,就违背了作者超越现实主义的本意,是一种含贬低意味的解读。《我们仨》涉及钱锺书的部分内容是虚写,有的文字荒诞不经,没找到,只坐在汽车里远远望望而已。铺书赞我他忌讳而旧地未去,无由“收脚印”,“读者能获知这一插曲,首先要感谢吴宇昭,她的《听杨绛谈往事》也是应该一页一页阅读的。这件小事表明,钱杨两人生前,过去与现在互相呼应,这条记忆之河奔流不息,而他们的言谈写作中亦存在着广义上的“互文性”。

钱锺书在《清华周刊》(第三十八卷第六期,1932年11月7日)发表的书评《鬼话连篇》中区分了“不朽”与“不灭”,前者是少数人的 privilege(特权),后者则为“一切人的 right(权利)”。他接着强调,中都有“神不灭”的思想,“用中国的话来说,我们是说‘形俎而神在’……‘神不灭’……从柏拉图的《斐多篇》直到 Broad 的‘在自然界之位置’,均有‘神不灭’的证明。”这里所说的 Broad 即英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查尔斯·邓巴·布劳德,《心在自然界之位置》是他一篇著作的题目,1925年出版。这时(1932年秋)钱杨的关系正处于微妙阶段。同年2月底,杨绛因吴大孚一些学生闹学潮,约了几位好友赶到清华大学请愿,三月初在古月园首次见到钱锺书,“偶然相逢,好像像姻缘前定”。钱锺书1998年年底去世,杨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译柏拉图的《斐多》(即《斐多篇》)。她在《译后记》(写于1999年12月18日)中说,她要借此“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笔者相信,钱锺书早期的散文,杨绛一定篇篇都是了然于心的。她在读清华大学研究生前,大概还是《鬼话连篇》让她第一次听说了柏拉图的这篇对话。翻译《斐多》,既坚定了她在后来在《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中完整表达的“灵魂不灭”的信念,又追忆起初见杨季康不久就陷入爱情的钱锺书。以前钱杨两人都互不相识,而这本著作的封面上下只有两个白点的仿宋体“斐多”,读者熟悉的钱锺书书法和印章非常显眼地缺席了。

2003年4月,杨绛《我们仨》写毕,三联书店以最快速度排印。大约在五六月间,董秀玉总编辑将我尚未装订的《我们仨》,嘱我写篇书评。封面还是一张三1946年摄于上海的照片,下面还盖有杨绛、阿圆和钱锺书的印章。我当即读了,但是文章却没有动笔,当时以为为怀念亲人的文字,往往是不宜评论的。二十多年过去了,值此杨绛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我还是想补交这一份拖延太久的作业。《我们仨》印了再印,发行量极为可观,而各种形式的评论也是不可胜数。笔者在此主要就这本书里带有梦幻或象征性质的一些文字略作解释,如果失之牵强,希望读者不吝指教。也许,我自以为值得分享的内容无非是拾人牙慧,这是我的无心之失。

在这一部分,关于钱锺书如何在医院生活、接受治疗和救护,尽付阙如,而写钱锺书的病情和住院过程,却是如数道来。两种处理方式形成了很明显的对照。杨绛历来看重并守护私人空间,晚年耗费很多精力阻止钱锺书私人信件的拍卖,她并不想在追念的故事里留下太多好事者将津津乐道的细节。

杨绛是古典诗词里道别、伤逝的符号,也是《我们仨》的叙述主体。汉文葬葬于潮陵,在长安东郊,附近的灞桥在唐代成为人们折柳送别的地方(“年年柳色,灞陵伤别”),《钱锺书选诗序》就收有多首写及杨绛的诗作,如王之涣的《送别》,刘禹锡的《杨柳枝词》(“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更把读者从唐代穿越到现在。英文垂柳称 weeping willow, weeping 也是为了哀念。但是对“我们仨”而言,杨绛还带来特别的回忆。1952年10月,钱锺书一家从清华搬到新北大道新建的中间层26号,新房是平房,住处并不宽敞(面积75平方)。据吴宇昭记载:“新店”前有小院,杨绛植柳五棵。铺书笑她“垂杨总是君家树,并作先生五柳翁”。五柳长喜人,没多久亦成荫,“双翠”(按:指1958年的反浪费保守运动)中上了大字报。“可见《我们仨》中杨绛的一再出现,除了表现作者本人(“君家树”)的离别之意,也是与两位逝者分享一个特殊时期的记忆。在《我们仨》所附照片中,有一张是钱瑛20岁时(虚岁,约1956年)在新北大中关园26门“外拍的,她身后两棵树上的叶子依稀可辨,像柳叶,其中一棵较小,《我们仨》的自述还留下一个疑问:“中关园新建,还没有一点绿色。阿圆陪我到邻近的果园去买了五棵柳树种在门前。”这个果园谅必就是杨绛去过的。她在1980年写的《吾先生》是三篇《旧事拾零》中的首篇,介绍了原燕京大学东门外的果园。园主姓董,五十多岁,早年留学美国,是位园林学家,称“吾先生”。钱家在邻居前植柳五株,钱锺书收室号“寄安”,表达的应是一个特定时期里陶渊明式的避世归隐意向。杨绛去果园购柳,必定是夫妻两人商量过的。

《我们仨》结尾处作者引了两句诗:“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这也是回应钱锺书的一段文字。《该语录》整理了中外典籍中以“影之梦”比喻人生的例子:“普罗塔克言曰:影已虚廓,影之梦更虚廓于影。”“接着钱锺书再说:‘又以人命危浅喻’‘如玻璃’……尤白乐天《简简吟》所谓:‘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钱锺书选诗序)白居易的作品最多,但未收《简简吟》。杨绛没有写自己的名字,或许是因为她把“大都”改成了“世间”。相信灵魂不灭,相信科学上的定律代表了恒久的性质,那么,在人世的对立面,还有无限的空间——灵魂不灭。

末了再与读者分享《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自己(写于2007年8月15日)末尾的文字。杨绛此时已96岁,她写道:“古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的《自省录》里说他和郑玄邦交成对的。我的自问自答是我自己的老,病,忙斗争中写成的,在斗争中挣扎着写,也不容易。拉一位古代的大皇帝作陪,聊以自慰吧!”正是这么一股气势让她在各种病痛中充实而丰盈地生活着。2011年7月8日的文汇报·金台刊出杨绛先生与本报记者周敏的笔谈《坐在人生的边上》,她虽已百开,“感觉每天一天都是新的,每天树叶子的变化,听鸟的啼鸣,都不一样,new experience and new feeling in every day”,她依然工作着,尽责尽力,一刻不息。

(作者系厦门大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